

王重民先生与敦煌遗书照片

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李德范

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存有一万三千余张敦煌遗书照片（其中包括一部分内容相同的翻转片和放大片），共一千五百余种。这些照片，从1934年起至今，已存在了近70年，在中国的敦煌学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现在却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

这些照片是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于1934至1939年，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命，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流落于海外的敦煌资料时所拍摄的。这期间，向达先生在1936年秋赴伦敦博物馆检阅敦煌遗书时，因受小翟理斯博士的刁难，看到的卷子，一共才五百卷左右，当时只将重要的照了相。1938年，向达先生曾去法国国立图书馆，携回的是数百万字的手抄资料。因而，这些照片的绝大部分，应是王重民先生拍摄的。

敦煌遗书在1900年被道士王圆箎暴露后，一拨又一拨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人等，纷纷拥至敦煌，劫走了大部分有价值的敦煌卷子。直至1909年8月22日，中国政府的学部才给兰州的制台拍了《飭查捡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的电报，要求把伯希和等捡剩的敦煌遗书送到北京。在这过程中，不仅“捡齐”没有办到，却又在迁运中，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撕裂、私藏的摧残。现在这批历尽磨难的敦煌遗书，全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但绝大多数是佛经。

正如王重民先生说的“现在我们要想研究敦煌的古书，最重要的在巴黎，其次在伦敦”。因此，在受袁同礼先生委派去英、法等国家进行考察时，王重民先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致力于搜集、研究敦煌遗书等资料，为此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力。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回忆当时王重民先生“终日埋头在敦煌卷子堆中，他还把伯希和劫去的卷子，选出较为重要的摄制显微胶卷”。“去英国伦敦暂住，他又去伦敦博物馆借阅该馆藏的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卷子”。“到了巴黎，巴黎如画的风光和繁华的生活，都没有使他陶醉，最吸引的，还是被劫去的祖国瑰宝—敦煌遗书。他是热爱祖国文物的学者，在国外见到这些被伯希和、斯坦因盗劫敦煌卷子，以及旧中国政府的束手无策，非常感愤，激励着他和其他研究敦煌的学者，去探索钻研，要与外国汉学家争高低，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所以，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写本上。他除了展阅卷子和编目外，还选出了较有价值的卷子，摄制显微胶卷。”在王重民先生《敦煌四部书六十年提纲》中说：“1935年，向达先生和我分别到伦敦和巴黎，才照来大批的四部书照片。应该指出，这是我们得到斯坦因掠取经卷的第一次，以前虽说零星的得过几种，是罗振玉从日本人得来的，而日本人又是从法国人、德

国人处得来的”。也就是说，在王重民等先生摄制照片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见过伯希和窃取的大部分敦煌卷子，也从没有大批见过斯坦因掠取的卷子。

这些照片的目录，袁同礼先生于1940年以《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的题名在《国学季刊》新二卷第四期上发表过一部分，也是唯一一次刊布这批照片的目录，但这次只有402种。其不全的原因所在，袁同礼先生已在文后写明：“摄取伯希和、斯坦因二氏携去敦煌古经卷影片，随摄随寄。迨卢沟桥变起，遂将继续所摄者，暂存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旋又在欧战爆发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总数约在万片，正在编目中。兹先将卢沟事变前收到者，编成简目，披露如右。”可想而知，当时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这些珍贵的照片必须历尽艰辛，这其中包含着的敦煌学先辈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这些照片由于抗日战争没有印行，并且直至今日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否则将会在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挥中发挥多么大的作用。

被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直到1957年，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才将英藏敦煌写本(S.1—6980)的缩微胶卷与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1—8697)的缩微胶卷进行交换。而伯希和所得，直到1979年，法国巴黎图书馆才提出交换馆藏敦煌遗书胶卷。

到60年代初，我国的敦煌资料的数量，由于王重民等敦煌学前辈的努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王重民在1961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总结敦煌遗书发现60周年时说：“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已经超过一万卷，其中有极少数是梵文和藏文的写本，绝大多数是佛经，其次是道经。在过去五十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只有在开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又入藏了一定数量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卷子和变文的卷子，最近又入藏了斯坦因全部汉文卷子的显微胶片，还有旧有的斯坦因、伯希和劫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部书照片和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和古佚佛经道经以及一些最重要的佛教、道教史料等照片。所以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照片、显微胶片等，已经超过了全部敦煌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研究敦煌学的最重要的基地了。”五十年代，在向达、王重民先生的推动下，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有了很多辉煌的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依靠的资料，除北图所藏敦煌卷子外，这些照片，曾经就是我国国内学者研究国外敦煌卷子的主要依据。

查这些照片，其中四部书比重最大，大概统计：

经部：易类7种；书类30种；诗类23种；礼类7种；春秋类31种；论语42种；孝经16种；小学类73种。

史部：正史类7种；杂史类19种；族谱传记类10种；地理类13种；诏令奏议类11种；政书牒文类42种；户籍类14种；法律文书13种；契约23种；社司转帖祭文等11种；

墓志邈真赞等 17 种。

子部：儒家类 6 种；兵家类 2 种；法家类 2 种；医家类 19 种；天文历算 85 种；书法舞谱等 12 种；杂家类 25 种；古类书 38 种。释家：佛经 108 种；论赞等 45 种；佛传记等 59 种；疏戒牒等 32 种；语录 8 种；愿文等 46 种；经序 9 种；佛经目录 13 种；寺历 5 种；音义 10 种；游记 2 种；仪轨题记等 16 种。道家类 152 种。

集部：诗文 60 种；词曲等 69 种；变文等 63 种；文选书仪等 49 种；文集 15 种。

除四部书外，还有佛像 58 照片种；观音菩萨等照片 77 种；经变、供养人像等 26 种；丝织品、佛幡等 16 种。

还有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文献 12 种。

共约 1500 余种。

今天，这批照片似乎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多年不被人注意。只是作为图书馆的一种藏品，将其束之高阁。

然而，这些照片中，的确还藏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极其珍贵的资料。仔细而有心的北大教授荣新江先生，就在其中发现了宝贵的东西。1996 年，荣新江先生为赴德国访问作准备，在这里找到了王重民先生从德国摄回的珍贵的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照片，并在德国与现存的资料进行了考证和比对。他在《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经过：“笔者赴德前，曾详细调查收集前人有关柏林吐鲁番汉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有幸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些王重民先生于二战前从德国摄回的照片，计 21 张（除去重复），……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曾发表了其中的韵书资料。这些旧照片只有考古学编号，长时间没人注意。这次在柏林，笔者查出了大部分照片的新编号，重新确认了这些照片的价值。有些照片所摄的残卷，现已不知所在；还有 3 张照片所示的卷子，比原卷多少不等地长出了一截，如 Ch/U. 6782d《一切经音义》写本，现仅存 6 行文字的上半，但照片不仅有其下半，还有前后 48 行文字，现已残失。”荣新江先生在多处文章中都不无感慨地写道：“王重民先生是北京图书馆派遣前往法国调查的敦煌写卷的，只短期走访过柏林民俗学博物馆，他留给我们这么可贵的材料，真让人感激不尽。”

据王重民先生《访柏林书记》所载，曾于 1935 年的 8 月 3 日至 14 日，利用暑期时间，访问过德国柏林。仅仅 10 天，就访得太平天国文献、明抄本《华夷译语》、《正统道藏》。虽然文中未提及吐鲁番文献，但此照片的确也是王重民先生柏林所得。或许因他的重点是敦煌遗书，没有着重就这些材料进行过研究。仅在他去世后，其夫人刘修业整理其遗作时，发现了王重民先生所作《跋中亚出土〈刘涓子鬼方〉》，后刊登于中华书局的《文史》第 24 辑。除此外，没有看到王重民先生有关吐鲁番出土资料的文章。刘修业先生后来在回忆中说：“1934

年10月25日跋中亚出土《刘涓子鬼方》（按：光绪二十七年，德国探险队在中亚吐鲁番得中国古文件，以回鹘文为最富，汉字文献间亦有之，现藏柏林普鲁士学士院。重民8月3日到柏林访书时，得见到此医书—《刘涓子鬼方》，为以前日人黑田源次等到柏林搜集中国古籍时所未见，故撰此《跋》以补日人所未及者。）（《文献》91：4，p.204）此残卷发现的意义，柴剑虹先生在此篇遗作的后记里也有论述：“查《隋书·经籍志》已著录‘《刘涓子鬼遗方》十卷，龚庆宣撰’。《读书斋丛书》本《鬼遗方》卷五后似有明显残缺，且无上述残卷之‘叙’。明钱曾所见《鬼遗方》宋抄本亦仅有五卷，可证是书宋时已残，而此曾经恰为卷九至卷十部分，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可惜不知当年重民先生所睹此残卷，今又流失何处，甚为可叹！”我们在这里可以告慰的是，不管残卷现流失何处，王重民先生当年拍回了此两页残卷的照片，现仍然完好无缺地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

王重民先生是古籍方面的大家，对中国古代典籍非常熟悉，特别是对四部书等古典文献造诣颇深，知识积累之丰厚，是没有人能超过的。因而才能对初出石室，以往从未见过的敦煌遗书，进行辨别分析，定出其价值。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得心应手地将斯坦因、伯希和所劫敦煌文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四部书，以及比较重要的历史文献、经济史料、科技史料、俗文学、变文、古逸佛经、道经及一些佛、道等宗教相关的重要史料都摄制了照片，携回国内。这些都是敦煌遗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就像周一良先生在《敦煌遗书论文集》序中说的：“有三先生在古典文献方面的学问和造诣，是他研究敦煌遗书取得成就的根本”。

现如今，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几乎全部公开。敦煌学研究沸沸扬扬，日新月异。其研究队伍浩浩荡荡，空前庞大。研究作品飘飘洒洒，琳琅满目，五花八门。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学术之林中一门显学。中国敦煌研究的水平之高，也在世界上赫赫有名。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尽管我们的敦煌研究已经今非昔比，高水平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王重民等先生几十年前曾经为敦煌学奠定过基础的著作和成就，在今天的研究中，我们却仍然不可缺少的需要翻阅和参考。这不能不证明，他们自身学术水平的高超，经过他们之手，从几万卷敦煌卷子中整理出的资料，的确毫无疑问是敦煌遗书中的精华。其所作的研究，质量和水平之高，至今也是仍然不容忽视的，是其他人以及其他相对时间的作品不可比的。

王重民先生所主持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多少年来，一直是世界上著录卷子最多、最详、最有用的一部敦煌汉文遗书总目。世界上，凡是研究敦煌学的人，没有不利用这本书的。其中王重民先生所编《伯希和劫经录》，对卷子的反正面都作了著录和考订，对卷子的题记等都加了必要的说明和记述，给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和提示。只有像王重民先生这样高水平的目录学家，才能有尽可能地给研究者提供完善的目录索引的意识，以及足够的水平。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青年时期曾工作在北平图书馆。图书馆的工作对他学术研究上的成长，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条件。周一良先生对当时的北平图书馆有过这样的评价：“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不仅仅是采购、编目、储存图书的后勤机构，也不只是普及知识的宣传教育机构。北平图书馆定期出版馆刊，登载学术论文、国内外新书评价和本馆入藏的新书书目。馆刊有些专号，学术价值很高，如圆明园专号，至今仍为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所利用。馆刊所载国外新书目录和评价，对于当时治文史之学的青年，在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方面极有用处，……当时的北平图书馆里有一批青年搞编目、索引、编资料、整理图书等工作，新书评介也往往由他们执笔。他们把工作与研究结合起来，从工作中得到培养提高，以后大都卓然有所树立。据我所知，已故的向达、贺昌群、谢国桢、刘节、赵万里、王庸诸先生，现在学术界知名的谭其骧、孙楷第、于道泉、张秀民、冀淑英诸先生，都是当年的北平图书馆馆员，而我不太熟悉的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于北平图书馆的还有不少。这种把图书馆办成研究学术、培养人才机构的办法，对于今天开发人才的事业来讲，应该说还有借鉴的价值。”周一良先生对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有其独到的见解和评价，赞誉辞中不乏崇敬。现如今，曾为我国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立下功劳的北平图书馆，已经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定期出版的馆刊仍像以往一样出版，代之“圆明园专号”的，是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等专题。而周一良先生所熟悉的知名图书馆馆员的最后一位已经走了，古籍大家、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也早已离我们而去。代之而起的新的工作人员都具有硕士、博士学位。当年北平图书馆与欧美各大图书馆的学术交流，作为国家图书馆仍在继续。互换馆员的频率比原来更高，众多的年轻学子陆续不断被派往各国图书馆。如此，我们怎能不相信有更多像王重民先生那样的高水平的古籍大家和目录学家，怎会没有更多像敦煌遗书照片那样珍贵资料，源源不断地收藏到图书馆。如此，我们的国家图书馆怎会不吸引更多的中外学子，怎会不能得到他们的更加信赖、赞誉和仰慕？

参考书目：

- 1、《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 2、《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 3、《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 4、《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 5、《冷庐文藪》王重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6、《敦煌遗书论文集》王重民 中华书局 1984。
- 7、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华学》3，紫禁城出版社，1998。
- 8、荣新江《柏林通讯》《学术集林》第十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 9、《文献》1991 第 4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 10、《文史》第 24 期，中华书局 1985。